

古『语』有之

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

俞志慧◎著

作为一种文类的『语』之成立

《国语·楚语上》申叔时论楚王问路

论人对『语』内涵的界定与讨论

『语』的体用特征初论

『语』的存在形式

『语』的存在形式之一：言类之『语』，散见部分释论

『语』的存在形式之二：言类之『语』，成篇篇章部分释论

『语』的存在形式之三：言类之『语』，成篇篇章之证明

言类之『语』研究

散见言类之『语』的溯源

言类之『语』的流传、变异及其思想史意义与局限

事类之『语』研究

事类之『语』中言的体用及两种『语』之间的关系

事『语』与言言的区别及事『语』的历史流变特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俞志慧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1
(中国思想丛书)
ISBN 978 - 7 - 5617 - 8233 - 0

I. ①古… II. ①俞… III. ①先秦哲学—研究
IV. ①B22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6581 号

古“语”有之

——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

著 者 俞志慧
策划编辑 王 海
项目编辑 刘 佳
审读编辑 朱妙津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江阴市天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16
字 数 29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8233 - 0/B · 596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目录

前 言 / 1

上篇：综合研究 / 1

第一章 作为一种文类的“语”之成立 / 3

第一节 《国语·楚语上》申叔时对楚王问释证 / 3

第二节 前人对“语”内涵的界定述评 / 10

第三节 “语”的体用特征析论 / 12

第二章 “语”的存在形式 / 17

第一节 “语”的存在形式之一：言类之“语”·散见部分释证 / 17

第二节 “语”的存在形式之二：言类之“语”·成篇/结集部分综览 / 21

第三节 “语”的存在形式之三：事类之“语”及其成立之证明 / 37

第三章 言类之“语”研究 / 45

第一节 散见言类之“语”的渊源 / 45

第二节 言类之“语”的流传、变异及其思想史意义举隅 / 52

第四章 事类之“语”研究 / 73

第一节 事类之“语”中言的作用及两种“语”之间的关系 / 73

第二节 事“语”与寓言的区别及事“语”的历史故事特色 / 79

第五章 作为教材之“语”的成立及其对后世训诫类读物的影响 / 82

第一节 作为一种教材的“语”成立之证明 / 82

第二节 作为教材的“语”对古代训诫类读物的影响 / 87

第三节 古代训诫类读物与儒家思想的互动 / 92

结语：“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启示和意义 / 96

下篇：个案研究 / 105

一、《国语》研究 / 107

（一）《国语》的文类及八《语》遴选的背景——从“语”的角度的研究 / 107

（二）《国语·周、鲁、晋、郑、楚语》的结构模式及相关问题研究 / 131

二、《论语》研究 / 154

《论语》与古“语”关系疏证 / 154

三、出土文献研究 / 172

（一）秦简《为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发微——从其集锦特色谈起 / 172

（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用曰》的编联——兼论其文体史意义 / 184

附录：先秦文献中散见的言类之“语”汇编 / 195

主要征引文献 / 234

后 记 / 243

前言

十年以前,为了对春秋诗学有一个具体深入的了解,我将《左传》、《国语》及其他先秦文献中引诗、赋诗、诵诗、议诗的内容逐条抄录、排比^①,在这个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先秦士人在言谈和著述中除了大量征引《诗》、《书》外,还同样喜欢引用先贤时哲具有精警特色的嘉言善语,这些嘉言善语以“语云”、“言有之”、“古语有之曰”、“谚有之”、“闻之”等形式出现,有时与《诗》、《书》并提,有时单独出现。为了明确那一个时期究竟引用了多少以及哪些嘉言善语,引用过程中有些什么规律,从中又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社会风气,这些嘉言善语本身的内在意涵,它们是否有着时代和学派的倾向……,我索性又做了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一边广泛阅读,一边做笔记,结果在先秦文献中统计出凡 500 多条散见的嘉言善语(文字完全相同者不重复统计,只在注解中提及),这就有了本书“先秦文献中散见的言类之‘语’汇编”部分。

先秦文献征引《诗》、《书》的统计工作已有了相当丰富的前人积累,关于先秦文献中征引当时和前人嘉言善语的统计工作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光靠一个人的阅读经验,去从事全部先秦文献的相关“语”料统计,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如此,凭已经统计所得的这个数据就足以昭示出这样一种信息:当时人对嘉言善语的重视程度并不下于对《诗》、《书》的重视程度,而且,引用嘉言善语的风气广泛地存在于先秦各家著述中,而引用《诗》、《书》则相对集中于儒家著述中。因为后来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世界中长期处于主流地位,所以《诗》、《书》也就升格为经典著作,而这些嘉言善语则相对处于附庸的地位。因此之故,作为整体的嘉言善语,它们被关注的程度就没法与儒家经典相比,这与先秦时期这些嘉言善语的数量及受重视程度明显不成比例,当然,后来的学者们对于它们的学术热情和由此而来的研究成果也远不能与前者相比——如果从全面系统研究的角度而言,甚至可以说它还是一个研究的盲点。

为了弥补以往研究中的这个缺环,我就顺着这个路子继续走下去,慢慢发现,除了这些散见于各家著述中的嘉言善语外,先秦时期还有大量或成篇或结集的嘉言善语,它们共同拥有一个名称:“语”。在当时,这种“语”还是一种文类——尽管在今天看来

① 作为那一阶段的成果,拙文《春秋诗学经典命题释证》已发于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2002 年第 1 辑(总第九辑),商务印书馆,2002 年 3 月,第 157—200 页,后收入本人所著《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九辑,北京三联书店,2005 年 3 月。

外延过于宽泛。它们无论是散见的,还是成篇或结集的,都有一个共同的体用特征:明德。围绕这样的体用特征,其形式主要地呈现为嘉言善语。因为有着这样一个体用特征,“语”于是被用来作为教材,尽管这样的教材,其外延的规定也并不像今天那样严格^①,但在当时是有着明确的使用记载的,楚庄王(前 613—前 591 在位)时期的楚大夫申叔时已提到用“语”教育太子,到汉文帝时的贾谊(前 200—前 168)自编《礼容语》、《修政语》(一部分还保存在其所著《新书》中)教导梁王、长沙王,最保守的估计,“语”的存在至少也有四百年之久。

在进一步阅读和研究的过程中,我又发现,“语”这一文类不仅仅只有记录格言、警句的形式,也有内涵“明德”功能的历史、传说、故事等以叙事为主体的那一部分,《国语》中的《晋语》、《吴语》、《越语》以及《战国策》的底本之一《事语》,贾谊的《新书·礼容语》和目前已佚的东汉荀爽《汉语》等即是,这些事语在内容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多来自历史和传说故事,所谓“采取成败”是也。

所有这些当时流传的或记言或叙事的嘉言善语,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在整个先秦时代并不是呈现出同样的面貌的。从内容上看,它在不同的时代有着各不相同的特色,那些数量众多的“语”与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思想潮流呈现出互动的态势。横向地看,一方面,丰富的嘉言善语作为当时人们经验的结晶、生活的指南,成为包括先秦诸子在内的全社会一般的思想资源、共同的知识背景、行为准则和话语平台;另一方面,人们对这些数量宏富的嘉言善语还是有取有舍的,进而又开展出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思想境界。由此一端,我们可以藉由他们的表达与那些嘉言善语的关系,去追溯他们思想的形成过程,这给我们了解和研究那一段思想史、学术史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角度,同时又恰好可以呼应葛兆光先生所提出的通过当时社会一般知识和思想去研究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说到研究方法,本课题研究伊始,就碰到一个如何对古“语”的概念进行界定的问题,虽说前贤就这个问题也有一些讨论,但那都是在传注中的随文释义或者讨论其他问题时偶尔涉及,因而不可能做到——我们也不便苛求——严密和周延,我们只能视

① 在讨论有关往圣先贤的学问时,在概念的把握上自然必要引进今天相应的逻辑限定,但若是完全以今律古,就有可能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譬如,若是严格用今天西方舶来的“哲学”、“逻辑学”概念去衡量先秦时期的相应学科,那么先秦就没有“哲学”和“逻辑学”。关于先秦是否有文学,虽然还不会成为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先秦文学的概念与后代文学的概念(譬如《文选》关于“文学”的理解)特别是西方对于 literature 的理解在逻辑上肯定不能完全重合——反过来,若是话语权在孔孟老庄或者李杜手上,西方是否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和文学也在不可知之数。因而,讨论往昔的命题必须充分尊重那个时期人们的理解习惯,视“语”为一种文类和教材同样也得有这样一种心理准备。

之为随机的、临时的和部分的解释。既然没有一个现成的解释可以套用,在研究方法上自然不能借助演绎的捷径,而不得不回到归纳法安身立命的本分,即从大量的具体材料出发。笔者正是从大范围、长时段中考察这种文类和教材的存在形式、体用特征,并使之尽可能地充分展开,这样做的好处是除了有可能恢复这种古老文类和教材的原貌外,还能重建它历时态的发生、发展、变化历程——这正是本课题的两大目的。同时,这种文类和教材并不是外在于人们的思想和话语世界的,相反,它们是作为人们的一般知识和思想资源而存在,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指导着人们的行动。于是,这些文献资料就具有了《诗》、《书》等经典文献无法替代的思想史意义,恢复这种文类和教材的原貌也是从一个角度和层面恢复当时人们的一般知识和思想、话语资源,尤其是能恢复“轴心时期”(Axial Period)思想家们的知识背景和思想、话语平台,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在时间上再往前回溯,在内容上更扎实也更丰富,这是本课题的第三个目的。

本书中《〈论语〉与古“语”关系疏证》和《秦简〈为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发微——从其集锦特色谈起》两篇论文是这方面研究的个案,孔子自称是一个“述而不作”者,孟子奉之为“集大成”者,但我们通常都把孔子看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这一点当然不错,问题是如何把一个学派的创始人与“述而不作”、“集大成”等命题联系起来考虑,特别是对像孔子这样的思想文化大家,在研究方法上,作一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思想寻根,对了解轴心时期的中国思想和文化应该很有启发意义。几年前,饶宗颐先生针对老子研究有过“先老时代”的提法,本书的《〈论语〉与古“语”关系疏证》则是想通过在《论语》中反映出来的孔子对前人思想的接纳与提升,看一看“先孔时代”或者说“前儒家时代”的思想世界及其对孔子的影响,这对孔子的“述而不作”说、孟子的“集大成”说也算是一个合理的安顿,甚至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否可以说是往源头处再前进了一小步呢?

秦简《为吏之道》公布后,关于其思想基调曾经引起过一阵讨论,学术界一方面注意到了这份新材料的格言谚语集特色,但另一方面又本着学派站队的思维习惯,认真地给它贴上学派标签,于是有了法家思想说、儒家思想说、道家思想说。前者唯政治运动马首是瞻,离开文本胡乱指派,无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可言,可以不论;后二者虽然不难从文本中找到理据,但又没有很好地解释它在那个法术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出现的原因。本人换一种思路,从当时社会的一般知识和思想出发,取古“语”为角度,将一般知识和思想与官方意识形态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行为区别开来,解释它出现的社会思想背景,发掘其中的思想史意义。其实,对后来的诸如弟子规、学规、家训、族规、行规、官箴、女诫等等,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我们也不妨从这个角度去观照,而

不是用政治站队的方法简单化地贴上标签了事,也不是用官方实际上操作的那些东西去衡量,更不要被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表面上的标榜与号召所蒙蔽。

《为吏之道》的儒道思想与秦代法术思想的主旋律明显不一致,这又引出了一个思想史话题。近年学术界重写思想史的呼声很高,甚至有一部分学者,在掌握大量新材料的基础上提出要动摇原有的思想史大厦的基石。然而,掌握材料是一回事,如何处理这些材料又是另一回事,譬如就秦简《为吏之道》而言,其中所提倡的确实是儒道思想,至少主体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平面地看待这种现象,要注意这份材料的针对性,它是针对下层官吏的,对于中下层官吏,自然不能教他们学会法术家的阴术和独断,阴术、独断之类只能是君王的一己之私,需要中下层官吏遵循的依然是靠社会自然秩序长期积累下来的优秀思想,如正直、忠信、恭敬、孝慈、爱民,这些已为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派和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学派所继承并发扬光大,秦王朝的大小官吏若不是实用主义地从儒家、道家思想中吸取,似乎也别无选择。但是,我们不能将《为吏之道》视为秦代思想世界的简单化约,专制者自身的荒淫无度、残暴成性并不影响他们要求民众乃至广大官员忠孝仁义、恭俭庄敬,古往今来,在上者自身之无良与对于在下者之诛求无厌通常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小民勒紧裤带克勤克俭往往是在上者纵欲挥霍的前提,在下者之驯良甚或愚鲁又是专制者恣意玩弄阴术的必要条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为吏之道》的出现不仅没有可能动摇原先的思想史框架,而且还会起支持和丰富的作用,因为它补充了一般知识和思想的视角。提供一个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正是本课题的又一个目的。关于重写思想史的话题,笔者之前曾说过:“从思想史、学术史方面讲,思想史、学术史每个时代都在重写,新材料的发现只是提供了重写的更多可能性,并非莫可或缺;从新材料方面讲,新材料的发现使得改写思想史、学术史中的某些说法成为必要,但必要性并非必然性。”^①在今天看来,在重写之前还有一个对新材料的充分处理问题,个案研究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用曰〉》的编联——兼论其文体史意义是本人处理新材料的一次尝试,但有待深入。

从形式上看,这些以“明德”为体用特征的文类也是在不断变化过程之中的。因为中国早期的文化、思想、学术与史官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即使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在其初始形态上也明显地烙印着叙事文的胎记,譬如《国语》中着重记言的《周语》、《鲁语》、《郑语》、《楚语》等,在结构形式上明显地受到了甲骨卜辞“叙辞——命

① 俞志慧:《〈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校笺》,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丛》第十一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2003年6月,第89页。

辞——占辞——验辞”四段式的影响,在记录嘉言善语的同时,还保留着嘉言善语的背景、言主和相关言说的结果,表现为“背景——嘉言善语——言的结果”的三段式。但在《论语》、《文子》等文献中,这第三段已经退化,第一段一般也只保留了言主而已,其结果是具有明德功能的嘉言善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突出。后来,就直奔主题,变成了纯粹的格言谚语集或者故事集,前者如秦简《为吏之道》、汉简《黄帝书·称》、《说苑·谈丛》等,后者如《国语·鲁语下》后半部分关于公父文伯之母的一组故事以及关于孔子的一组故事。再后来,在汉初人称为《新语》的陆贾的著作那里,本来是集体创作的“语”与某一思想者的作品(子书)在概念上完全重合了,尽管这之前有《管子》(如《国语·齐语》与《管子·小匡》在内容上重合)、《曾子》(《大戴礼记》中五篇有关曾参的文章学界一般认为可归于《曾子》)、《苏子》(学界有很多人认为《战国纵横家书》的部分内容可视为《苏子》)中的某一部分被收编到各种“语”中,但这样彻底的视纯粹的个人作品为“语”似乎还是第一次。当然,不管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加工,“述存亡之征”、“原兴衰之由”的写作方式以及“明德”尤其是“明君王之德”的功能特征则保持着一贯的面貌。

这种形式上的代兴也带来了研究工作中的困难,学者们在考虑对“语”这种文类的认定特别是确定究竟哪一些材料可放到“语”的范畴中讨论时总是左右为难,尤其是很难给“语”下一个在各个时代、各种形式(包括叙事的和记言的、散见的和结集的)都普适的定义。但若是我们能用一种通变的眼光去看待它,这种兼容性很强的特色反而使我们更能看出那个时代这种文类的丰富性和生命力。本书有关《国语》研究的两篇论文,正是想借《国语》这一标志性的“语”的研究个案,来凸现这种文类的形式意义,并经由“语”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关于《国语》长期以来的一些成说,如“《春秋外传》说”、“国别史说”,进而解决《国语》研究中若干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八“语”遴选的背景、目前《国语》章次分合中存在的一些错误等。

为了从研究框架上体现古“语”不同阶段的特色,我选择了《国语》、《论语》和秦简《为吏之道》作个案研究,三份材料大致可以代表“语”在形式表现上的三个不同阶段。《国语》和《为吏之道》的具体成编时间缺乏进一步的文献资料,只好本着不知盖阙的精神姑俟异日和识者;《论语》的成编时间,据本人研究所得,当在公元前429—前400年之间^①,这相当于青铜器研究中的一个标准器,可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大致的时间坐标。无论是《论语》、《为吏之道》,还是更早的《国语》,其中体现出来的对文明成果的敬

^① 详见俞志慧:《〈论语〉编纂年代考》,台北:《孔孟学报》总第82期,2004年9月,第1—27页。

意,把前贤时哲的知识、经验、思想涓涓滴滴积累起来的精神,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观念和习惯,这种方法、观念和习惯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对于视“语”为一种文类的认知,称相关的“语”为当时的一种教材的提法较易为学界所接受,故而本书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也就没有安排更多的篇幅。“语”作为教材的功能后来被大量的童蒙读物、家训、学规、官箴、帝范等所代替,后者从教材功能到传播方式、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古“语”的天然继承者,它们在传播儒家思想、型塑我们的文化、培育我们的民族精神方面作用巨大。作为一种实用文体,它们所宣扬的是一种与世俗社会密切相关的生活准则和人生智慧,因而它们在继承和传播儒家思想时特别看中了其中的伦理精神,这也就使得儒家思想朝着世俗的实用方面而不是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开掘。与此相关的研究,无疑也有着重要的意义,限于本书论题,本部分讨论只是点到为止。

在决定对先秦古“语”进行研究之时,我的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恢复“语”这种古老教材和文类的原貌,盘点在先秦时期究竟有哪些可以称为“语”的材料^①,理清这种文类的发展、演变线索,及其与相关文类的纵横关系,同时藉此展现当时人们的一般知识和思想,尤其是春秋战国思想家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平台,当然还有这个背景和平台的细微变化(这个工作的最初成果在“孔学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本书的总论部分是该长篇论文的扩展和细化)。^② 看看几年前设定的这个目标,可以说本书已经大致上达到或者接近实现。但囿于本人学力,其中仍然有不少遗憾和不足,只好留待来日修改补充,也竭诚希望学界前辈和同行有以教我。

2008年6月

① 李镜池在《周易探源·周易筮辞考》中曾说过这样的话:“古书里所谓‘先民有言’或‘人之言曰’,就是这类口耳相传的格言。可惜我们的古先没有人把这类格言收集拢来做个总集,像古希伯来人之有《箴言书》(基督教《旧约》书中一部);若果有的话,这才是真正十足讲哲理的‘经典’呢。”(见氏著《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0—51页)我这一部分工作做的就是李先生所想看到的工作,或能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② 俞志慧:《古“语”述论》,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编:《“孔学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0月,第223—264页。

上篇：综 合 研 究

第一章 作为一种文类的“语”之成立

春秋时期,作为贵族子弟的教材,六经以外还有什么?

六经显然是属于那种比较高雅也比较艰深的文化,那么,相对比较通俗的,同时也能为普通大众所掌握的那种属于一般社会经验和伦理常识的材料还有哪些?

根据本人对传世文献和考古发掘成果的研究,“语”就是这样的一种材料。它作为古人生存经验、知识积累的结晶和为人处世的指南,其中酝酿着民族精神,充满了先民的经验和智慧,成为六经以外的教材之一,也是当时人们的一般知识和共同的思想、话语资源,尤其是春秋战国思想家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平台。它们流传时间长久,空间广大,因而也成为后人的一般知识和思想、话语资源,如从那些嘉言善语浓缩而来的时不可失、本枝百世、临深履薄、众口铄金、唇亡齿寒、君舟民水、冠贵履贱、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等格言谚语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短小精悍的故事。它们或散见于文献,或成篇、结集,作为一种曾经长期存在的文类,丰富了我国古代文献的宝库,也孕育了后世集锦式的记载片断的嘉言善语、遗闻轶事的文类,同时又是我国箴戒类文体的源头,其对我们民族语言的影响自不待言。从深层次看,“语”还影响到我们的思想和思维习惯的形成。本书拟综合传世周秦汉文献和近几十年出土材料,最大程度地恢复“语”这种教材的原貌,探讨“语”这种文类的体用特征、存在形式、渊源与流变以及其思想史、学术史和文献学意义,藉此展现当时人们的一般知识和思想,尤其是春秋战国思想家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平台,发掘在“语”的传播过程中若干文化现象的现代启示。

第一节 《国语·楚语上》申叔时对楚王问释证

《国语·楚语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申)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劝勉,奖励)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显扬)明德而废幽昏(幽昏:暗乱)焉,以休(嘉、喜)惧其动(行为);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涤除)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使议知百官之事业);

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如惇叙九族），行比义（犹云义之与比）焉。”^①

申叔时（楚庄王大臣，庄王在位时间：前 613—前 591）提到的《春秋》、《诗》、《礼》、《乐》属于后来“六经”的范畴，当然，在内容上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严格地说，六经中的《诗》、《礼》（即《仪礼》）、《乐》即从前者加工改造而来。今之《春秋》“惩恶而劝善”的编撰目的^②与申叔时所说的“耸善抑恶”正可互证。关于《诗》，不仅作诗者可以诗明志，用诗者也可赋诗言志、明志，《左传》、《国语》中所见以后者为多，听诗者亦可藉以展开联想——所谓“诗可以兴”是也，孔子所概括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等等功能^③与申叔时所说的“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④基本吻合。《春秋》和《诗》应分别是当时的历史和诗歌教科书，《礼》是当时教育贵族子弟从事吉、凶、军、宾、嘉等礼仪活动的教科书，《乐》则是音乐教科书。荀子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荀子·劝学》）《礼记·乐记》亦云：“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其中“敬”、“顺”正是申叔时所说的“上下之则”的根本义，长幼之序、贵贱之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等“上下之则”的外化也就是“敬文”、“礼文”。达到“中和”、“极和”的境界当然就不会粗鄙和浮躁了，这就是音乐所起的“疏其秽而镇其浮”的作用。这里，申叔时对几种教材都只是指出其功能而不是给出一个明晰的定义。好在此后经过一番加工改造，它们获得了“经”的地位，后人也不必再通过抽象的概念去了解它们了。

其余五种教材则不如前述四种幸运，没有能够荣登“经”的宝座，古籍散佚严重，故从传世文献中也不易见其全豹，后人想了解它们就得多费一番文献考索功夫。

三国时吴的韦昭（204—273）努力揭示出它们的内涵，注云：世，“谓先王之世系也”。《论语上·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中，其宗有司曰：“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韦注曰：“世，世次先后也。”^⑤《周礼·春官·瞽矇》“讽诵《诗》、《世》、《奠系》”，东汉郑玄

① （三国·吴）韦昭注，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528 页。

② 见《左传·成公十四年》及（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

③ 《论语·阳货》：“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④ 贾谊《新书·傅职篇》引本句“导广”作“广道”，“广”与“显”皆为动词，“道”与“德”皆为名词。见（西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72 页。参以《郑语》“（黎）能昭显天地之光明”（“昭显”作动词）、《吕氏春秋·期贤篇》魏文侯语“段干木光（广）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新书》之语似较今本《国语》为长。

⑤ 上海师院古籍整理组校点本《国语》，第 174、175 页。

(127—200)注引杜子春语曰：“《世》、《奠系》谓《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是也。”^①《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有以下一段文字：“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赣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诸也）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其中之“世”字，《四部丛刊》本和王文锦点校的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皆属下读，由不知《世》为一种文本之故也，当依《周礼》改。从上引经传可知，申叔时所说的“世”，当如今所见之《世本》（辑本）和《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帝系》之类，前辈的荣耀是后人自信力的根源之一，而前人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则是后来者的宝贵财富。《世本》中的《谥法篇》乃根据死者生前的品德和行事给予相应的谥号，如幽、厉，如文、武，这些无疑具有“昭明德而废幽昏”的功能，这种立此存照的方式对生者自然有着号召和警示作用，如孟子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孟子·离娄上》）。

令，韦注：“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国语·周语中》周定王（前606—前585在位）时记单襄公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②可为时令之例，单襄公与申叔时几乎同时，其所引用者当然要更早。后来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大戴礼记·夏小正》、《淮南子·时则》、敦煌悬泉汉简《四时月令诏条》^③等亦其例也，后世的《四时纂要》、《岁时杂记》则为其流亚。唯属于春秋时期的完整的时令于今已无从得见，但殷周春秋的时令仍可从甲骨文、《左传》、《国语》中的零散句子和《逸周书·时训》、《大戴礼记·夏小正》、《管子·玄宫》、《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传世文献中推测出大概。另外，《国语·周语中》云：“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④此令系官法，在依时授政的时代，人们特别讲究谨守明时，历法的确立、颁布、推行皆是一种非常严肃而隆重的政府行为，故而时令与官法具有同样的意义，百业之兴作、百官之政令都与相应的时节互动，并皆得以冠名为“令”，故云教之“令”能使知百官之事业。

训典，韦昭谓“五帝之书”，《左传·襄公四年》有云：“《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西晋杜预（222—284）《集解》：“夏训，夏书。”^⑤《庄子·齐物论》谓“《春秋》经世，先王之

①（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清）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97页中。

② 上海师院古籍整理组校本《国语》，第68页。此前单襄公引“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当亦在此类“先王之官法、时令”之例。

③ 见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④ 上海师院古籍整理组校本《国语》，第74页。

⑤（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1933页。

志”，唐初成玄英疏：“先王者，三皇五帝也。”^①疑皆本此，然缺乏文献证据，实为悬揣之词，清崔述(1740—1816)《补上古考信录》已驳之甚详。^②检诸载籍文献，“训典”一词在《国语·周语上·祭公谏穆王征犬戎》中已经出现，曰“我先王不啻……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唯韦注云：“训，教也。典，法也。”^③未将之视为一种固定的文献。同书《晋语八·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中范宣子家臣誓祐有这样一段话：“世及武子(士会)……及为成(谨按：指晋成公，前606—600在位)师，居太傅，端刑法，缉训典，国无奸民，后之人可则。”^④韦昭将“缉”释为“和”，但从“训典”与“刑法”并提且使“后之人可则”看来，缉当系“辑”之借，训典也应该是一种具体的文献，其时恰与申叔时相先后。到了一百年之后，这样的文献已为一般人所不晓，楚国的左史倚相因为有“能道训典”等等的学问，遂为楚大夫孙圄奉为楚宝。张岩先生《〈国〉、〈左〉文体与王官之学》一文甚至猜测《楚语上》中《左史倚相微申公子亶》、《左史倚相论唯道是从》二文是左史倚相能道训典的直接证据，也就是说这二章中的几则掌故就是训典。^⑤细审文本，所述卫武公老而愈恭，子囊、子木违命而合道，谷阳竖与芋尹申亥从命而违道等事确有“比义”之效。

训之为体，当即《逸周书》前三篇《度训》、《命训》、《常训》之类是也，三篇以王者师的口气宣讲为政牧民之道，三训之义分别是关于法度、天命、寻常的训教，据黄怀信先生研究所得，“三《训》有可能出自西周。不过以文字观之，似当为春秋早期的作品”^⑥。验诸上述誓祐的一段话，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散见者，如《左传·襄公九年》载中行献子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⑦，《国语·鲁语下》则云“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⑧再与《周语》、《鲁语》其他几处“先王之(遗)训”相参，知“训”为其时政治、伦理社会的若干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据《左传·襄公四年》魏绛继《夏训》而详说后羿史事，《国语·郑语》史伯述《训语》中之一则怪异传说，则可知训诫之语亦有隶于史事和传说者，结合《国语·晋语四》“前训”、“明训”^⑨等评论，知这类训

① (清)郭庆藩集释：《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3、85页。

② 详见(清)崔述：《补上古考信录》，《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③ 上海师院古籍整理组校点本《国语》，第2—3页。

④ 同上书，第458—459页。

⑤ 张岩：《〈国〉、〈左〉文体与王官之学》，《新原道》第二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67—177页。

⑥ 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⑦ (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1943页。

⑧ 上海师院古籍整理组校点本《国语》，第208页。

⑨ 《郑文公不礼重耳》：叔詹谏曰：“臣闻之：亲有天，用前训，礼兄弟，资穷困，天所福也。”《寺人勃鞮求见文公》：对曰：“事君不贰是谓臣，好恶不易是谓君。君君臣臣，是谓明训。明训能终，民之主也。”

诫体已为寺人等辈所知晓,可见其已为当时一般人所共知。“典”与“训”并提,则义亦近之,有典制之意,如《逸周书》之《程典》、《宝典》,前者谈为官在上者所宜遵循的法则和治理土地、四民的方针,后者系武王与周公旦关于修身的一次对话,据黄怀信先生研究,二篇已见引于《左传》和《国语》,^①则可知申叔时之时已有类似的材料。

故志,韦昭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上揭成玄英疏则谓“志,记也”,郑樵(1103—1162)《通志·总序》云:“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②近人吴曾祺(1847—1926)《国语韦解补正·吴语》“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条“此志也,岂遽忘于诸侯之耳乎”句下亦云:“志为记事之书,如《春秋》之类。”^③这个判断极可能将“志”与《春秋》相混淆,这显然不符合申叔时将二者区别对待的态度,同时,这个判断是否会将那些以记言为主的材料拒之门外呢,若是,则记言之体就不当涵括其中。鉴于这两种情况,有必要弄清“志”的性质。王晖先生说:“‘故志’是专及前代兴衰成败的书,《逸周书·史记》及《左传》成公十五年子臧所引《前志》、文公二年所引《周志》、昭公元年子产所引《故志》均是此类。”^④其中“专及前代兴衰成败”之说盖出自韦注,所给出的文献中有关《志》的材料则有助于我们理解“故志”的性质和内容,好在这方面的内容并不太多,故将《左传》、《国语》中部分引及《志》的内容逐录于后,或可免于凭空推测。

1. 《文公二年》狼臆引:“《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

谨按:此语又见于《逸周书·大匡》,彼作“勇如害上,则不登于明堂”。《大匡》所记录者乃“周武王灭商后归周途中,在管城训导管叔的一篇诰辞,中心是教其治民安邦之法”^⑤,其重点所在并非记事,狼臆称之为《周志》,可见当时“志”的外延其实十分宽泛。

2. 《文公六年》史骈引:“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

3. 《成公十五年》子臧引:“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

① 详见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8、101—102页。

② (南宋)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页。

③ 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卷十九,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2页。

④ 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⑤ 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05页。

4. 《襄公四年》君子语：“《志》所谓‘多行无礼，必自及也’，其是之谓乎？”
5. 《襄公二十五年》孔子引：“《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6. 《昭公元年》子产引：“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文又见《礼记·曲礼上》和《坊记》）

谨按：《孟子·滕文公上》滕定公世子之父兄、百官引《志》曰：“丧祭从先祖。”在性质上与本条相近，皆为当时的礼俗安排。

7. 《昭公三年》叔孙豹引：“《志》曰：‘能敬无灾。’又曰：‘敬逆来者，天所福也。’”
8. 《哀公十八年》君子引：“《志》曰：‘圣人不烦卜筮。’”
9. 《国语·晋语九》士茁对智襄子语引：“《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

谨按：以上各条的原始材料是否记言记事并重，文献不足征，但仅从所引述材料看来，它们无疑全在记言之例，或如“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是一种礼俗安排。

10. 《国语·楚语上》“范无宇论国为大城未有利者”：“其在志也，国为大城，未有利者。昔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征、衙。叔段以京患庄公，郑几不克，栎人寔使郑子不得其位。卫蒲、戚寔出献公，宋萧、蒙寔弑昭公，鲁弁、费寔弱襄公，齐渠丘寔杀无知，晋曲沃寔纳齐师，秦征、衙寔难桓、景，皆志于诸侯，此其不利者也。”^①

本条为纯粹之叙事，与《逸周书·史记》例同。

11. 《国语·吴语》“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申胥进谏曰：“……王其盍亦鉴于人，无鉴于水。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以不入（通“纳”）。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闕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罢（通“疲”）弊楚国，以间陈、蔡。不修

① 上海师院古籍整理组校本《国语》，第547页。